

支那文學史的研究與想像

——以日治時期謝雪漁漢譯久保天隨《支那文學史》為中心的討論*

王韶君

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博士

摘要

1907年，台灣文人謝雪漁漢譯久保天隨的《支那文學史》，並連載於《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久保天隨在《支那文學史》中，以西洋文學的研究方法撰寫支那文學史，目的在於建立支那文學的學科知識和學問形象，其中更延伸出對於人種想像與地理想象的言說。透過謝雪漁的譯介，可以看見日治前期自日本本土傳入台灣的支那文學（史）知識，以及文學、文明等概念的生成，包含著以現代文明的觀念進行文學研究的方法在台灣的初現。同時，藉由該譯介亦可了解日治時期台灣人透過閱讀和翻譯，取得殖民者所提供的支那知識之歷史脈絡。

關鍵詞：支那文學史、東亞文獻、久保天隨、人種想像、地理想象

*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的寶貴建議，使本論文更臻完整，謹此致謝。

A Study and Imaginations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 Discussion of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Kubo Tenzui'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y Hsueh-Yu Hsieh under Japanese Rule

Wang Shao-Chun

Ph.D.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 1907, the Taiwanese literary scholar Hsueh-Yu Hsieh translated Kubo Tenzui's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o Chinese version, and it was also serialized in *Kanbun Taiwan Nichinichi Shinpo* (Chinese Taiwan Daily News). In the book, Kubo Tenzui wrote about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western literature. The purpose was to establish the disciplinary knowledge and the scholarly ima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further extended into discussions on ethnic and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Through Hsieh's translated work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we can obtain the knowled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concepts of literature and civilization introduced from Japan to Taiwan in the early Japanese rule; moreover, the concepts containing methods for literary research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modern civilization made their first appearance in Taiwan. In addition, through the translation we can see how the Taiwanese received Chinese knowledge from the colonists through reading and written translations during the Japanese Rule.

Keywords: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East Asia Literature, Kubo Tenzui, Ethnic Imagination,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支那文學史的研究與想像

——以日治時期謝雪漁漢譯久保天隨《支那文學史》為中心的討論

一、前言：「支那文學」到台灣

日本於1904在東京帝國大學的學程課目中，將原「漢學科」分列為「支那哲學」和「支那文學」兩科目，並分屬為哲學科和文學科，儘管在1932年將兩學科合併為「支那哲學支那文學科」，但在此之前，「支那文學」被日本視為一門學問的身分已然被建立。日本本國在明治時期以「支那文學」為名的學科、講義，除了東京大學，亦有早稻田大學（前身為東京專門學校，明治15年[1883]開校），該校於明治19年（1886）發行政治科、經濟科、法律科、歷史科的講義錄，明治28年（1895）1月起刊行「文學科講義錄」。¹久保天隨在1904年版的《支那文學史》序中曾表示，應早稻田大學之託，第二次開授支那文學史，該書便是依前稿為基礎增刪而成。²1928年3月16日台北帝國大學成立，同年12月設立「東洋文學講座」，當時，久保天隨、神田喜一郎、原田季清等人便是該講座的教師群，³隨著「東洋文學講座」科目的細分，「支那文學」作為學術研究的專門科目形象正式進入台灣。

一般提及久保天隨通常會聯想到代表日本漢文學家的身分，以及其與台灣文壇的往來，許多研究皆注意到久保天隨的漢詩文與東亞漢文的交涉與影響。⁴目前有關台灣文人謝雪漁（1871-1953）於1907年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1 和田英信，〈明治期刊行の中国文学史——その背景を中心に——〉，川合康三編，《中国の文学史観》（日本東京：創文社，2002.02），頁166-167。

2 久保得二述，〈稿本支那文學史の首に書かす〉，《支那文學史》（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04），頁1。

3 蔡祝青，〈帝國殖民與文學科的建立：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東洋文學講座」初探〉，洪淑苓、黃美娥主編，《第一屆文化流動與知識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7.05），頁281-334。

4 李嘉瑜，〈旅行、獵奇與懷古——久保天隨漢詩中的澎湖書寫〉，《成大中文學報》18期（2007.10），頁117-142。黃美娥，〈久保天隨與臺灣漢詩壇〉，《臺灣學研究》7期（2009.06），頁1-28。森岡ゆかり，〈久保天隨と魏清徳——近代日・台文人交流點描〉，《近代漢詩のアジアとの邂逅——鈴木虎雄と久保天隨を軸として》（日本東京：勉誠出版，2008.02），頁199-249。陳速換，〈久保天隨及其《澎湖遊草》之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碩士班論文，2003）。

上》連載漢譯久保天隨《支那文學史》的研究中，柯喬文從殖民地漢文知識的移植、學校體系的知識生產、殖民台灣將支那文學作為學科的歷程、作者與編譯者的文化跨界與掌控殖民知識等觀點，提出久保天隨的支那文學史具有「既肯定又批判的實證思維、環境種族塑造國民性」的史觀與特點。⁵ 同時，支那文學史的漢譯也涉及「文學」一詞的概念與內涵在台灣的生成與發展，許倍榕討論不同語言對「文學」的定義、殖民地台灣在舊學與新學交替之下「文學」一詞的新舊意涵，以至官方政策、文學路線差異下的「文學」概念演變，其中也以久保天隨《支那文學史》的出版與謝雪漁的漢譯，討論明治時期關於「文學」一詞的質變情況。⁶ 上述研究皆論及久保天隨的支那文學史與文學觀念，惟有關版本差異、諸蘭人種與歐亞地理等部分皆尚未論及，而這一部分則是筆者有意著墨之處。

久保天隨的《支那文學史》曾經多次改編、出版，不同年代出版的著作，其內容與目次亦有差異，謝雪漁漢譯所使用的版本則是1904年由早稻田出版的日文版，漢譯版於1907年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連載，呈現當時台灣對於自日本本土傳入支那文學史的受容、研究與翻譯情況。久保天隨在《支那文學史》中以西洋文學的概念進行撰述，除了是對學問科目的建立與鑽研，也隱含著對當時日本所倡導的東亞觀點的應和，特別是，對於支那文學史的撰寫以及對支那文學內涵的解釋。⁷ 久保天隨多次在書中例言與內容裡，強烈表達出對當時日本本土研究者及其他支那文學史著述的批評，流露出其對個人研究能力的「自信」，關注撰寫支那文學「史」的理由與必要性，明顯展露出以日本為

5 柯喬文，〈文學成史：殖民視域中的久保天隨與其支那文學史〉，《中極學刊》6期（2007.12），頁45-66。柯喬文以1903年東京人文社日文版與1907年《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刊載的漢譯版進行對照、討論（請參見柯文註32，頁53），並提出日治時期台灣的支那文學發展脈絡與殖民權力之間的合作關係。但是，筆者查閱資料後，發現謝雪漁是以1904年早稻田大學出版部日文版本進行漢譯，柯文遺漏日文版（1903年版和1904年版）在研究方法上的改寫，以及1903年版「第一講」和1904年「序論」的差異，故相關問題還有待進一步討論。

6 許倍榕，〈日治時期台灣的「文學」概念演變〉（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15）。

7 相關論述請參閱神田喜一郎，〈久保天隨先生について〉，久松潛一編，《明治文學全集41》（日本東京：摩筑書房，1977.03），頁3-4。久保舜一，〈久保天隨〉，《明治文學全集41》，頁381-384。黃得時，〈久保天隨博士小伝〉，《中国中世文学研究》2期（1962.03），頁48-53。森岡ゆかり，〈久保天隨と魏清徳——近代日・台文人交流點描〉，《近代漢詩のアジアとの邂逅——鈴木虎雄と久保天隨を軸として》，頁199-249。黃美娥，〈久保天隨與台灣漢詩壇〉，《臺灣學研究》7期，頁1-28。

本位的寫作視角，以西洋文學的研究方法對支那文學的內涵進行定位，並藉以跟西洋對話的企圖，更有趣的是，這項關於支那文學（史）的譯介也延伸出日本出對於人種與地理的想像。

因此，筆者在本論文中，企圖以1907年台灣文人謝雪漁對久保天隨《支那文學史》的漢譯，觀察日治前期由日本本土傳入的支那學，運用哪些方式對支那及其文學（史）進行論述、延伸出哪些中國想像與言說，以及台灣文人在此過程中對於文學的態度與思考。

二、關於《支那文學史》及其漢譯

1907年由台灣文人謝雪漁漢譯日人漢學者久保天隨的《支那文學史》（1904），並連載於《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內容傳達了久保天隨對支那文學史的看法，也間接顯現日本本土設立漢學科的時代背景。

（一）久保天隨與《支那文學史》

久保天隨（1875-1934），本名得二，號天隨，又號默龍、青琴、兜城山人、虛白軒、秋碧吟廬主人等。父親久保讓次（1846-1901）在明治30至32年間曾任職於台東廳，病歿於該地。久保是日本歷史學家，亦具漢學知識，書畫皆通，亦懂英語和德語。1915年集結在中國旅行時的寫生，出版兩大冊彩色畫集。⁸昭和3年（1928）2至3月期間曾來訪台灣，當時雖由台灣文人魏清德（1886-1964）⁹接待，但兩人自1929年才開始有更深入的聯繫，爾後並共同結社「南雅詩社」。1928年台北帝國大學成立，甫設立「東洋文學講座」，1929

8 久保舜一，〈久保天隨〉，《明治文學全集41》，頁381、383。

9 魏清德（1886-1964），號潤庵、潤菴，筆名雲、潤菴生、潤庵生、怡擬子。先後畢業於新竹公學校（1903.03）、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1906.03）。曾任中港公學校、新竹公學校訓導。1907年參加第二回普通文官考試合格。1910年1月，應聘「臺灣日日新報社」記者，歷任記者、主筆、編輯員，1927年升任漢文部主任，長期負責報社漢詩、漢文的編審工作。除具漢學素養，亦涉染書畫金石。參閱林進發，《台灣官紳年鑑》（台北：民眾公論社，1934.10），頁36。國勢新聞社編，《台灣新聞總覽》（台北：國勢新聞社台灣支社，1936.07），頁5。黃美娥，〈另類現代性：《臺灣日日新報》記者魏清德的文明啟蒙論述〉，《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台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12），頁188-190。黃美娥，〈導論〉，《魏清德全集 壹·詩卷》（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12），頁22。余美玲，〈日治時期傳統文人魏清德的書畫活動與南宗風尚之探析〉，《台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4號（2010.12），頁291-359。

年正式開課，聘久保天隨擔任教師。其後亦曾參與主導「台灣總督府史料編纂會」的成立與運作。¹⁰ 1932年與尾崎古村、谷河梅人等人抵澎湖，著有《澎湖遊草》。¹¹

久保天隨所著的《支那文學史》曾有數次的改編與出版，芳村弘道曾據此進行研究。¹² 久保天隨在1903年出版的《支那文學史》表示支那文學史是他的專門領域，長期鑽研此學科，該書是因應「大日本文學會」之託，集結自其在1902年秋天，發表在該會《文學講義》上的〈支那文學史〉所彙編而成。¹³ 久保天隨《支那文學史》最早的版本於1903年由東京人文社正式出版，當時，日本正值明治時期，同時期的古城貞吉（1866-1949）、笹川種郎（1870-1949）、兒島獻吉郎（1866-1931）等人，也出版許多以「支那文學史」為題的著作，¹⁴ 而久保天隨的《支那文學史》正是其中之一。¹⁵ 此時期日本學者陸續出版相關的《支那文學史》著作，也為中國的文人造成一些刺激，林傳甲便是以笹川種郎《支那文學史》的翻譯本編輯《中國文學史》。¹⁶ 關於明治時期許多日本漢學者投入研究支那文學的現象，根據和田英信的研究表示，當時「文學史」作者當中的多數人，在重疊的時代裡，在相同的或相近的空間裡學習。這與「文學史」集中在明治20年代後半至30年代間出現有明顯的關連。

10 久保天隨的著作豐富，有《澎湖遊草》、《秋碧吟盧詩抄》、《關西遊草》、《閩中遊草》、《琉球遊草》、《支那文學史》等。久保天隨去世後，其藏書由台北帝國大學（今台灣大學）收購，名為「久保文庫」。詳請參久保舜一，〈久保天隨〉，《明治文學全集41》，頁381-384。森岡ゆかり，〈久保天隨と魏清徳——近代日・台文人交流點描〉，《近代漢詩のアジアとの邂逅——鈴木虎雄と久保天隨を軸として》，頁199-249。黃美娥，〈久保天隨與台灣漢詩壇〉，《臺灣學研究》7期，頁1-28。柯喬文，〈文學成史：殖民視域中的久保天隨與其支那文學史〉，《中極學刊》6期，頁43-66。

11 陳速換，〈久保天隨及其《澎湖遊草》之研究〉，頁120。李嘉瑜，〈旅行、獵奇與懷古——久保天隨漢詩中的澎湖書寫〉，《成大中文學報》18期，頁124。

12 芳村弘道，〈久保天隨とその著書『支那文學史』〉，川合康三編，《中国の文学史観》（日本東京：創文社，2002.02），頁63-79。

13 久保天隨，〈例言十則〉，《支那文學史》（日本東京：人文社，1903.11），頁1-2。

14 明治時期出版的支那文學史尚有：古城貞吉，《支那文學史》（1897/1906）、笹川種郎，《支那文學史》（1898）、兒島獻吉郎，《支那大文學史》（1909）、兒島獻吉郎，《支那文學史綱》（1912）。另可參閱許倍榕，〈日治時期台灣的「文學」概念演變〉，頁65-66。

15 內田泉之助，《支那文學史》第3卷（日本東京：共創社，1935），頁93。陳廣宏，〈藤木の「支那文學史」講義録について——東京專門學校文學科成立初期の中國文學史講録〉，《中國文學研究》36期（2010.12），頁16。芳村弘道，〈久保天隨とその著書『支那文學史』〉，川合康三編，《中国の文学史観》，頁63-79。

16 橋本恭子著，涂翠花、李文卿譯，《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的體驗與解讀》（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10），頁128。

而這群出現於明治時期的作者群，早期多就學於東京大學文學部（明治19年[1886]以後，改為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今東京大學），久保天隨則是在明治32年（1899）畢業於漢學科。¹⁷

上述是有關明治時期日本漢學家投入「支那文學（史）」研究的情況，另一方面，「支那文學（史）」的出現也與日本「支那學」、「漢學」的研究概念有關。陳瑋芬在論及日本漢學觀念的演變時，討論不同領域中所生成的日本漢學內涵與定義，包含關於日本「漢學」與「支那學」之間認定的齟齬。¹⁸李慶在《日本漢學史》中回溯1895-1918年間日本的漢學概況，指出當時對於支那文學的研究，從「專題研究逐步取代了通史學編纂」，文學研究界「集中在小說和戲曲領域，關於傳統的詩歌古文領域的注釋也有相當程度的出版，被稱為近代中國文學研究的『注釋時代』……。」¹⁹許倍榕亦提出日本在明治時期的中國文學史著作大多接近「學術史」性質，甲午戰爭後「則明顯從傳統『學問、文章』的文學研究，朝向西歐各國文學史的取材及研究模式，對語言藝術的探討有較多關注。」²⁰並依據久保天隨《支那文學史》在「研究之必要及方法」中的內容，歸納久保的著作，「較之前行的古城貞吉、藤田豐八、笹川種郎等人，更趨向脫離經學傳統……。」²¹

誠如上述，與久保天隨同時期的支那文學研究者不少，以古城貞吉和笹川種郎為例，在他們的著作中同樣也關注支那與文明、人種、地理之間的關係，並述及支那國民（性）的特色，在時代編排上都是從支那文學的起源開啟寫作，例如：古城貞吉在「第一篇 支那文學の起源」中分為五部分，從上古、三代、周代至諸子時代以前作為分期。笹川種郎在「第一期 春秋以前の文學」中，從三皇、五帝開始談起，進而分以書、詩、易分節撰寫。久保天隨在

17 和田英信，〈明治期刊行の中国文学史——その背景を中心に——〉，川合康三編，《中国の文学史観》，頁160-166。

18 陳瑋芬，〈第二章 「漢學」、「儒教」、「孔子教」與「支那學」〉，《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的嬗變》（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06），頁71。

19 李慶，《日本漢學史 第一部：起源和確立（1868-1918）》（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2），頁338、353、355。

20 許倍榕，〈日治時期台灣的「文學」概念演變〉，頁65。

21 同註20，頁66。久保得二述，《支那文學史》（1904），頁3-4。文學士 久保天隨述，雪漁 謝汝銓譯，〈支那文學史〉，《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761號，1907.07.18，3版。

「上古文學」分三代文學與周代文學，討論易、書、詩、孔孟等著作。

此外，要再順帶一提的是，久保天隨在1903年版的例言和第一講當中，以「東亞文獻研究者第一人」²²自許，表現出十足的自信，那麼，當時的讀者在閱讀久保天隨的著作時又有什麼樣的經驗呢？神田喜一郎表示：

久保天隨在他們之間，而且幾乎是到最後都是以在野的態度一以貫之，特別是他在明治三十年至大正初期之間，持續大量的著作活動。先生會被列入作者之一決非沒有理由。

但是，今日平心而論，試著讀先生當時所寫的著作，具有了不起的價值的內容竟很少。²³

相對於神田喜一郎的評價，黃得時回憶就讀台北帝國大學時期閱讀久保天隨《支那文學史》的感想，認為：

舉凡冠以中國文學史之名者，雖幾無遺漏、蒐集且遍讀之，久保先生的文學史在當時眾多的文學史著作中雖毫不遜色，也有非常多可稱成一家之言之處，但儘管如此，卻不怎麼被學界重視，……從今日的眼光觀之，久保先生的文學史固然有各種缺點，但他不畏當時學術風氣對小說戲曲的蔑視，而把他們大舉放入文學史中，從這點就足以展示先生高明的見識，我相信其價值也自應有更高評價。²⁴

上述兩位的回憶主要都呈現出久保天隨著作在當時的時代意義，同時，透過此一段落的討論，也可以了解久保天隨及其同時代日本漢學家書寫支那文學史的時代風潮、久保天隨及其著作在此時期的特色，以下則從謝雪漁漢譯〈支

22 久保天隨，〈第一講〉，《支那文學史》（1903），頁2。

23 神田喜一郎，〈久保天隨先生について〉，《明治文學全集41》，頁3。中文由筆者自譯。

24 黃得時，〈久保天隨博士小伝〉，《中國中世文學研究》2號，頁51-52。黃得時，〈百年來日人研究漢學名著提要彙編〉，江寶釵主編，《黃得時全集11·論述卷五》（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12），頁411-415。

那文學史〉來觀察台灣人接收到的支那文學閱讀。

（二）謝雪漁的〈支那文學史〉漢譯

台灣文學中具有現代概念的「文學」觀點與近代化的發展脈絡有關，許倍榕對台灣「文學」概念的出現與生成作了詳細的說明，指出日本統治台灣之後，台灣的漢文傳統也面臨變化，「新式學術受到普遍的關注與討論，『新學』、『實學』、『文明』等詞彙頓時成為流行語，在知識階層之間被視為新的必備教養。」²⁵並說明約在1904年前後，

台灣人知識階層之間所談的「文學」，除了保留舊義，也出現意指廣範圍的「寫作」，並開始使用相對於此的「狹義文學」、「純文學」等用語，以指涉重視「美」、「情」，讓讀者產生感動的寫作，形成一種廣狹義並存與調和的概念。²⁶

身為台灣文人的謝雪漁也是在這項概念轉變過程中進行漢譯。謝雪漁，台南人，本名汝銓，字雪漁，號奎府樓主、奎府樓老人。具有傳統文人的身分與學養，日治時期以第一秀才的身分進入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就讀，1905年起擔任「臺灣日日新報社」漢文記者，也曾任台北州協議會員、台灣總督府學務課、公學校警察官練習所教官、台灣公學校教科書編輯委員、經營藥局等職。1912年赴南洋馬尼拉擔任《公理辦》記者，返台後接任《昭和新報》、《風月報》主筆。1909年與洪以南等人創設瀛社，繼洪之後，擔任第二任社長。²⁷

明治40年（1907）7月18日起，謝雪漁漢譯的〈支那文學史〉開始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上連載，止於明治41年（1908）3月19日，從譯文中可以得知久保天隨〈支那文學史〉是依朝代區分時期，劃分為前編與後編，以及「序

25 許倍榕，〈日治時期台灣的「文學」概念演變〉，頁61。

26 同註25，頁95-96。

27 〈編輯臚錄〉，《臺灣日日新報》，1917.02.17，5975號，6版。〈謝汝銓〉，《臺灣日日新報》8231號，1923.04.23，4版。林正三研究主持，《瀛社社史之整理、纂修與研究》（台中：台中市政府文化局，2005.04），頁156。

論」、「上古文學」、「中古文學」、「中世文學」、「近代文學」等細目，包含原著對各朝代文學的說明，以及各時期的主標題與副標題。呈現久保天隨企圖以「說文明，談學問」的方式，對（支那）文學、文明進行論述，以及對於撰寫支那文學史的評價。不過，謝雪漁漢譯至一百五十回時，「然為本報編輯便宜計」，只翻譯到「六朝文學」便中止。²⁸ 爾後（停刊兩年），雖預告「此後將由本報編輯長伊藤學士（伊藤壺溪）改稿續刊」，²⁹ 然而似未再刊。

只是，謝雪漁為何會以久保天隨的著作進行漢譯呢？由於筆者目前掌握的史料有限，無法做進一步的釐清，僅能從謝雪漁在《奎府樓詩草》收錄與久保天隨有關的詩作中，看見其知聞久保天隨與《支那文學史》的初始，在〈次久保天隨博士移居龍安陂瑤韻〉中描寫久保「東國文明開學閥。南疆風物補詩鈔。苔痕履齒應嫌印。不許柴扉野客敲。」³⁰ 在〈大學教授久保天隨博士〉描寫「重逢海嶠慰生平。南雅騷壇仗主盟。舊著支那文學史。譯書早為布東瀛。」³¹ 也在〈悼久保天隨博士〉中，道出自三十年前即知聞久保天隨，並對先生一生的文學成就表示讚許。詩文如下：

南溟講學駐文旌。三十年前早識名。衰德楚狂歌鳳日。不孤詩幸有同聲。
磊落巖奇不世才。中邦文籍最淹該。苦心（研求）論著西廂記。贏得頭銜
博士來。
讀破群書察古今。一枝史筆力雄沈（生花史筆力雄沈）。宮廷受命稽皇
蹟。清貴真堪比翰林。
聞說（見說）當年是酒豪。寓齋終日醉陶陶。謫仙（青蓮）一斗篇成百。
雅欲才名與竝高。
官舍幽清築大安。南疆花木足盤桓。廣文溫飽六千俸。尚有才人不遇嘆。
欲低品格強謏阿。其奈稜稜氣骨何。藉得清詞伸抑鬱。一篇吟就碎心多。

28 文學士 久保天隨述，雪漁 謝汝銓譯，〈支那文學史（百五十）〉，《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963號，1908.03.19，3版。

29 本社，〈豫告閱報諸君〉，《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504號，1910.01.01，15版。

30 雪漁 謝汝銓，〈次久保天隨博士移居龍安陂瑤韻〉，《臺灣日日新報》11144號，1931.04.23，4版。謝雪漁，《奎府樓詩草》卷上（台北：謝師熊，1931.11），頁12。

31 謝雪漁，《奎府樓詩草》卷下（台北：謝師熊，1931.11），頁2。

埋身好是不埋名。大小文章百卷成。游草閩南新集（詩集）出。石遺一序（新序）見生平。

海外風騷幾縉紳。鄭林而後不無人。應知劫幻諸遺老。猶有（尚有）文才冠八閩。

燕翼貽謨好子孫。縱然為庶亦清門。九重巒帛（珍幣）頒紅白。省識泉臺泣聖恩。

蓬萊絕海一仙山。旅櫬何須故國還。椒韭杯盤（敦盤）寒食節。松楸墓道夕陽間。³²

潤菴漫評此詩：

圖書寮編纂官。及帝大教授。其清貴。真比諸金馬玉堂。文人氣骨。不肯阿世。作者似亦自抒寫其胸中之抑鬱耳。³³

謝雪漁和魏清德在詩文中道出久保天隨的性格與文學成就，謝雪漁的漢譯則為我們引介久保天隨在撰寫動機與目的上，以文化、東方、文明作為開場主軸，並以日本為中心的立場對支那文學史進行發言，很大一部分來自對歐西文學研究的模仿與運用，以及包含著「介入」支那文學這門學科的企圖。在「序論」一開始，便提出支那屬於世界三大文化發源地（支那、印度、歐羅巴）之一，有意與「現時最誇其盛之歐羅巴文化」相較，以找出支那文化有益之處。³⁴ 在論及支那人種與支那文學特質時，以「諸蘭」（ツラン，Turán）人

32 本詩同時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1934）和《詩海慈航》卷下（1935），題目與內容皆略有不同。本文以1934版為主，（）中之文字為1935年版。請參閱：雪漁 謝汝銓，〈悼久保天隨博士〉，《臺灣日日新報》12281號，1934.06.12，8版。謝雪漁，〈輓久保天隨博士〉，《詩海慈航》卷下（台北：瀛社出版部，1935.10），頁18-19。

33 雪漁 謝汝銓，〈悼久保天隨博士〉，《臺灣日日新報》12281號，8版。

34 久保得二述，《支那文學史》（1904），頁1。文學士 久保天隨述，雪漁 謝汝銓譯，〈支那文學史〉，《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761號，1907.07.18，3版。

種為中心，³⁵詳實介紹諸蘭人種的體格、歷史、居住地。³⁶在描寫支那的自然天災如何對支那人產生影響時，提到「支那文學」是保守的、實際的，支那除了「與天然力抗敵外。又對於異族。為激烈戰爭。」「以如上兩種。而為內外之作用。然此強盛之精神。亦恒有起伏。排他之極點。則起厭惡異族之感情。自尊之失敗。則生疑運命怨神靈之痛苦。」³⁷「支那文學。既為實用的。又為貴族的。」³⁸而這些觀點是以日本視角出發，對文明與學問進行觀看方法，用以編纂支那文學史。

同時，我們也能夠透過謝雪漁的翻譯看見當時的翻譯特色，一類是音譯詞彙，如：セム一森（閃）、ハム一含（米）、ツラン人種一諸蘭人種、スキユタイ帝國一思基有台帝國（按：西台帝國）、バビロニヤ一覓米羅尼野（按：巴比倫）等。另一類是直接引用，包含文學詞彙，如：文學、文學史、東亞文獻、歐西學者、歐西文學、保守精神、形式主義等。還有世界地理詞彙，如：裏海、印度、希臘、歐羅巴（按：歐洲）等。³⁹

以上是關於謝雪漁〈支那文學史〉的漢譯，讀者得以了解久保天隨在著作中以歐西文學與文明等視野去編寫支那文學的態度，並使之成為一種學問的企圖。以下，將分別以久保對於《支那文學史》的研究方法與文學要素兩部分來進行討論，以更深一層爬梳其對支那文學史的思考。

三、《支那文學史》的研究方法與文學要素：歐西文學與東亞文獻

35 諸蘭（Türàn）民族的分布「起自支那海與大洋沿岸，行經阿爾泰（Altai）山脈、土耳其斯坦（Trukestan）平原、裏海、黑海地方，貫穿喀爾巴阡山脈（Carpathians），至多腦（Donau）盆地。實為廣大的區域。」身體特徵，「一般的諸蘭族是中等身材、寬而扁平的臉、小而歪傾的眼睛、高顴骨、寬扁的鼻子、厚唇和低額頭。膚色是黃中帶點褐色，髮為直髮且全黑，少鬍鬚。」詳請參：今岡十一郎，《ツラン民族》（日本東京：竜吟社，1942.01），頁29-30、51。

36 久保得二述，《支那文學史》（1904），頁2-3。文學士 久保天隨述，雪漁 謝汝銓譯，〈支那文學史（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762號，1907.07.19，3版。

37 久保得二述，《支那文學史》（1904），頁7-8。文學士 久保天隨述，雪漁 謝汝銓譯，〈支那文學史（三）〉，《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763號，1907.07.21，3版。

38 久保得二述，《支那文學史》（1904），頁11。文學士 久保天隨述，雪漁 謝汝銓譯，〈支那文學史（四）〉，《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765號，1907.07.23，3版。

39 久保得二述，《支那文學史》（1904），頁2-6。文學士 久保天隨述，雪漁 謝汝銓譯，〈支那文學史〉，《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761號，3版。〈支那文學史（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762號，3版。

久保天隨在〈序論〉一開始便以文化的起源展開論說，首先，說明文學、文學史與國民文學之間的關係，認為要以科學敘述有關國民特有的文學的起源變遷與發展之跡，提出東方人種（諸蘭人種）與歐羅巴文化（セム[森，Semmites]和ハム[含，Hamitic]人種）的對比，說明人類文化的發源地在東方，並進一步說明要了解「東亞諸蘭人種」則必先染指支那文學史。⁴⁰並以藝術說明文學的研究方法，表示：藝術是以形式和內容的調和最為上乘，文學史研究兩者都重要。藝術作品是由時代共通의思想和個人愛好所形成的，文學內容也必須截然區分兩者（時代共通의思想和個人愛好）。其研究主要是以上述根本性原則為憑據，為求記述簡易明晰，將貫徹精確的理論斷定和公平的批判態度。⁴¹久保認為：

故文學史之研究。宜細心情緻。且為簡淨明晰。不可忘精確之論理的斷定。及公平之批判的態度。彼以文士之傳記。書籍之解題。紛々臚列。誇示其繁富冗雜。自以為盡文學史之能事者。非僭則陋。非雜則妄。予輩固不欲與之也。⁴²

其次，是關於文學與人種、環境之間的關係。久保天隨在1903年版《支那文學史》書頁前節錄了Goethe（1749-1832）的對談錄，這段引文出自與友人Eckermann於1827年1月31日討論支那小說這類作品時的內容：

他們（按：支那文學家）所寫的作品深思熟慮且富有庶民性，沒有強烈的激情，也沒有詩意的激昂，我認為這部分與我寫的《赫爾曼與陀羅特亞》（按：Hermann und Dorothea，敘事詩，刊於1797年）和英國李

40 久保得二述，《支那文學史》（1904），頁1-2。文學士 久保天隨述，雪漁 謝汝詮譯，〈支那文學史 序論（一）研究之必要及方法〉，《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761號，3版。

41 久保得二述，《支那文學史》（1904），頁3-4。文學士 久保天隨述，雪漁 謝汝詮譯，〈支那文學史 序論（一）研究之必要及方法〉，《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761號，3版。

42 同註41，頁3-4。文學士 久保天隨述，雪漁 謝汝詮譯，〈支那文學史 序論（一）研究之必要及方法〉，《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761號，3版。

察頓（按：Samuel Richardson，1689-1761）的小說極為相似。⁴³

（德文：Es ist bei ihnen alles verständig, bürgerlich, ohne große Leidenschaft und poetischen Schwung und hat dadurch viele Ähnlichkeit mit meinem ›Hermann und Dorothea‹ sowie mit den englischen Romanen des Richardson. —Goethe—⁴⁴

（日譯：彼らのすることは何でも思慮ぶかくて市民的で、激しい熱情もないし詩的な昂揚もない、そこはわたしの『ヘルマンとドロテア』やイギリスのリチャードソンの小説とたいへん似ている。）⁴⁵

Goethe認為支那小說「沒有強烈的激情，也沒有詩意的激昂」，在風格上也與自己的詩與英國李察頓的小說相同，在這段對話中，Goethe還提出支那文學的另一項不同之處是小說中的「自然總與人物共生共存。」⁴⁶ 久保天隨以支那的人種、自然環境以及文學在不同時期的發展，作為探究構成一國文學內涵的文學要素。這樣的分類方法與法國批評家泰納（Hippolyte Table，1828-1893）所提出的孕育文學創作與發展的三因素「環境、種族、時代」有密切關係。橋本恭子在討論島田謹二的文學觀時，便回溯島田在台北帝國大學接觸到泰納的英國文學史學說並受其影響之事，也提到當時日本撰寫中國文學史，「是因為法國人泰納寫鄰國英國的文學史這件事，為日本人寫中國文學史提供了正當的理由吧。」⁴⁷ 久保天隨在《支那文學史》中將支那文學分為十二期，在種族方面說明支那國民是漢人種，認為（他們）是最早居住在巴比倫尼亞（バビロニヤ，Babylonia）的諸蘭人種的支系，自然（與支那人）有相似之處，保守的、實際的是支那人文的特徵。⁴⁸

43 原文為德文，久保天隨也以德文載於《支那文學史》（1903），筆者參考《ゲーテ全集 第十一卷》自行中譯。請參閱：ゲーテ（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著，菊池栄一、富士川英郎、大山定一、伊藤武雄，《ゲーテ全集 第十一卷》（日本東京：人文書院，1965.06），頁272。

44 久保得二，《支那文學史》（1903）。Goethe的引文收錄於1903年版和1907年版的日文版中，但未收錄於1904年早稻田大學出版的日文版。

45 同註43。

46 同註43。

47 橋本恭子著，涂翠花、李文卿譯，《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的體驗與解讀》，頁125-144。

48 久保得二述，《支那文學史》（1904），頁5-6。

關於漢人種分布與環境方面的描述，在1903年版中有較詳細的說明。久保寫道：

雖然漢人種原自何處而來的說法，歐西學者之間也眾說紛紜，只知道來自支那的西邊，即通過中央亞細亞山脈，穿越山川險阻，在太古鴻蒙、雲霧深處的黃河邊落地生根的原始國民。此原始國民因不曾被征服過，其建國精神是保守的、不夠進取。⁴⁹

久保天隨認為黃河的自然環境加速促進了支那人種的特徵，外在景象也在無形之中改變了人，黃河附近的自然環境益促使人種特徵到達極致。更進一步描述黃河附近的土地雖不無豐饒，但只有高粱一種風景，十分荒涼，離海遠、淨是岩山，並有嚴重水害。這和一年一次沖走肥沃的土地，省去了施肥的手續的尼羅河的洪水不可相提並論。支那人的祖先，感到人力的微弱，也因而認識了神靈的存在，敬畏自然、尊敬天。⁵⁰並進一步與印度、希臘的情況作比較，說明支那人服從於機械式的勞力，只得到衣食，精神生活卻無餘裕、有思索能力卻排斥與現世事物無關、無純然的形而上學。雖有想像力卻荒謬至極，缺乏美的要素、迷信卻無未來的觀念，宗教也不發達。⁵¹

這裡顯示出有趣的問題是，久保天隨以歐西文學研究方法，說明環境對種族（支那、漢人）影響的概念進行文學研究，但在內涵上，卻是依著下一部分將會討論到的有關日本對「諸蘭民族圈」（ツラン民族圈）的幻想與征服之說。同時，我們也可以在解讀久保天隨著作的過程中，發覺其對支那文學「史」的認定與書寫，提醒我們注意殖民者對殖民地文化統合的持續性。在日本本土相關的支那文學史著述中，固然主要都是以日本為本位進行撰述，對支那文學進行發言。然而，這樣的「動機」傳入殖民地台灣之後，象徵的是對台灣進行知識宣傳的建立，並帶有以東亞姿態論述的用意，以東亞支那為對象、

49 久保天隨，〈第一講〉，《支那文學史》（1903），頁3-4。

50 同註49，頁4-5。

51 久保天隨，〈第一講〉，《支那文學史》（1903），頁4-5。久保得二述，《支那文學史》（1904），頁6-7。

掌握對支那的發言權，並向世界西方發聲。在日本初期的東亞論述中，觀看的對象是中國，對話的對象卻是西方歐洲，目的在確立日本東亞發言的位置。

〈支那文學史〉的譯寫也呈現台灣文人在日治初期參與殖民者的知識論述，透露當時西歐各國「出現編寫本國文明史的潮流，以作為凝聚國民文化認同的教材」。以及「1900年代的殖民地台灣並沒有這種經驗，也不具備撰寫『本國文學史』的空間及條件，而是透過既成的『日本文學史』或『中國文學史』，認識新式學術脈絡下的文學。」⁵² 在久保以「東亞文獻研究者第一人」⁵³ 自居之同時，也看見其企圖與歐西文學對話的目的，對話的主題包含支那文學史與撰述文學史的能力，在這個層次上，借鏡歐西文學的文學史方法來進行文學史的思考，也藉由這項對話進行對支那文學發言的正當性權。

研究方法展示的是對支那文學的書寫態度，間接呈現日本對東亞文獻進行發言的意圖。文學要素則是對支那文學內涵的界定，透露出日本對東亞諸蘭人種的觀看、想像與征服欲望，展現的是日本以「東亞文獻研究者」的姿態，對同屬東亞文獻圈成員的支那文學進行學科編纂的用意。在久保天隨此時期的支那文學史書寫中、在台灣文人的翻譯裡，提示我們：日治初期台、日雙方共同運用「支那」進行發言的時代現象，同時，這項書寫提供台灣文人參與對話的可能，台灣文人依憑著帝國給予的支那知識，接受到想像中國的方法。

四、建立在人種想像與地理想像的支那文學史

謝雪漁在譯作中傳達了久保天隨援引西洋文學、歐西文學的研究概念、以文化與發源地引領出以支那文化進行言說的可能。那麼，謝雪漁自身對於文化、文明、文學的概念又是什麼呢？在1905年〈說文明〉一文中，謝雪漁便引述法國學者考察文明五處發源地（支那、印度、埃及、希臘、羅馬），說明文明的發展與內涵，該文將文明發展的時間分為上世、中世、近世，將文明分為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認為支那在近世文明中已落人後，印度與希臘復入野蠻時代，只有埃及與羅馬所遺留的文明混合為一，成為十六世紀後歐羅巴的文

52 許倍榕，〈日治時期台灣的「文學」概念演變〉，頁65。

53 久保天隨，〈第一講〉，《支那文學史》（1903），頁2。

明，表示文明不斷在發展，「是不能泥一時之文明。以為止境。又焉能執一端之文明。以自滿足乎。」呼籲「學文明者。須求其真。必窈其似。勿徒醉心物質之之文明。而不殫心精神之之文明焉。」「有物質之之文明。又有精神之之文明。始得謂為文明也。」⁵⁴

其次，是關於謝雪漁對文學概念的看法，黃美娥在討論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知識新秩序的生成一文中，述及小說文類的出現、對於「文學」及其內涵的認知時，以謝雪漁在1907年10月28日發表的〈文學辨義〉提出了「文學」在當時的特色，⁵⁵謝雪漁的這篇文章發表於在〈支那文學史〉連載期間，他說明「文學」在日本、西洋、支那之間不同的意義，也舉例帝國大學之中文學、法學、經濟學、政治學等學科的不同。將〈文學辨義〉與漢譯〈支那文學史〉合併觀之，則更能呈現謝雪漁在思考文學的內涵時，除了顧及文藝性，並兼顧文明與文化的概念。謝雪漁在透過漢譯引介久保天隨以支那、印度、歐羅巴三處文化源頭，說明文明與人種之間的關係：

光明自東方而生。日出暘谷。而人類文化之發源地。亦胥在於東方。現時最誇其盛之歐羅巴文化。實承之「森」「含」之兩人種。加以潤色者。獨奈何此兩人種之衰滅。比諸印度猶早。奇哉種族之運命。其地愈東 其壽愈長 既如此。則研究在極東。為最長壽「諸蘭」人種唯一之代表者。漢族之獨創的文化。其大有興趣。可以豫期也。然予輩以唱導之者。非出於一片之好奇心。實有至大之必要故也。⁵⁶

「森」（セム，Semites）、「含」（ハム，Hamitic）兩人種源自《舊約聖經》中「創世紀」諾亞方舟的預言故事，Semite源自人名Shem（中東地區的猶太人），Hamitic則是Ham（人種上屬於黑人），兩者都非西方白皮膚人

54 謝雪漁，〈說文明〉，《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249號，1905.10.28，4版。

55 黃美娥，〈從詩歌到小說：日治初期台灣文學知識新秩序的生成〉，《當代》221期（2006.01），頁54-57。雪漁攷誌，〈文學辨義〉，《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847號，1907.10.28，3版。

56 文學士 久保天隨述，雪漁 謝汝詮譯，〈支那文學史 序論（一）研究之必要及方法〉，《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761號，1907.07.18，3版。久保得二述，〈支那文學史〉（1904），頁1-2。

種，而是有色人種，久保天隨援引此有色人種用以連結東方文明，並進而延伸至與諸蘭人種、漢人種有關的想像。其中，「諸蘭」人種是日本為侵略蒙古圈所提出的地理與人種想像之說法，⁵⁷久保天隨以諸蘭人種說明漢族文化的淵源，從諸蘭人種的體格、特質、居住地，一直到文化精神內涵的描述，⁵⁸久保認為這些都與人種性格有關，因此有研究支那文學史的必要，而論述方法是以人種與文化建立在支那作為發源地的基礎，以支那文學起源於「東方」的論述作為素材，提示出支那文學的重要性，這裡所提示的是1900年代日本人對於東亞人種的想像，久保天隨在《支那文學史》描述文學史與人種的關連如下：

文學及文學史之為何者。茲不縷述。惟願記清。某國民之文學史。就其國民特有之文學。起源變遷。為科學的敘述。大凡國民。與個人相同。各有思想。各有感情。各有想像。以為精神的生活。截然與他不同。於種種現實之行為。附與動機。然則但尋踪外界客觀之變化。即歷史上動靜起伏之事蹟。不就內界主觀之發達。而探究之者。不得謂盡得一國民之真相。故欲熟知東亞、「諸蘭」人種之文化。自然當先染指於支那之文學史。⁵⁹

這段文字將東亞、諸蘭人種與支那文學等同排列的用意在於連結支那文學的地位，並顯示久保天隨以日本研究者的姿態去編纂支那文學的目的，以及透過支那文學重新思考文明、文化的內涵。特別是在以文明、文學史思考文化融合上：

前述三種之文化。將來果能融合調和與否。實為緊要之大問題。然予輩考察之。亦非無先就過去之歷史的關係。仔細領知者。現時歐西之學者。多不辭多大困難。專心一意。從事東亞文獻之研究者。皆基於如上

57 請參考今岡十一郎的《ソラン民族》（1942.01）。

58 久保得二述，《支那文學史》（1904），頁5-6。

59 久保得二述，《支那文學史》（1904），頁1-3。文學士 久保天隨述，雪漁 謝汝詮譯，〈支那文學史 序論（一）研究之必要及方法〉，《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761號，3版。

之理由。蓋既感為必要。而好奇之心。益助成之也。予深慨同胞。即新忘舊之陋劣心情。及於學藝之上。棄其便宜位置。反為豎子之名。在寶山前。而惜舉手投足之勞者。得毋類此歟。⁶⁰

在這個段落中，謝雪漁漢譯出幾項重要的概念：「新舊」的對象、作為「寶山」的東亞文獻、以歐西學者為指標的研究者態度。這三項是承接自久保天隨原著中關於「歐西學者、東亞文獻、寶山」的素材，並以提問的方式表述「予輩研究對象之支那文學。果有價值者否。」⁶¹進而又曰：

所謂秦火楚炬以下。凡經八九回之大災厄。然頹殘之餘。其文獻之今存者。猶堆積於四庫。汗牛充棟。殆不足為其譬。要之。支那文學。其壽最長。故其數冠絕宇內。而其質果何如。此問題雖應在予輩研究完成之後。始能解釋之。然於此便宜上。得豫為結論。以普通之歷史的知識。而推究之。可為簡明一條之概論。⁶²

更極積表露出以世界文明、文化進行思考的企圖，與世界文學中的歐西文學相比，提領出支那文學的特質：

支那文學。其質比之世界之某文學。非必為遜色者。在世界文學史上。亦足占領幾多帙者。其比諸現今日新之歐西文學。縱如何辯護之。固不能相若。無他。為保守精神及形式主義所制縛。大都標榜教訓的旨意。不發自由之感情。時流淺薄卑近之弊。即其理因之一半。考察漢族之性格。容易知之也。⁶³

60 久保得二述，《支那文學史》（1904），頁4-5。文學士 久保天隨述，雪漁 謝汝詮譯，〈支那文學史 序論（一）研究之必要及方法〉，《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761號，3版。

61 久保得二述，《支那文學史》（1904），頁4-5。文學士 久保天隨述，雪漁 謝汝詮譯，〈支那文學史 序論（二）支那文一般之特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762號，3版。

62 久保得二述，《支那文學史》（1904），頁4。文學士 久保天隨述，雪漁 謝汝詮譯，〈支那文學史 序論（二）支那文一般之特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762號，3版。

63 久保得二述，《支那文學史》（1904），頁5。文學士 久保天隨述，雪漁 謝汝詮譯，〈支那文學史 序論（二）支那文一般之特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762號，3版。

這樣的文學特質與支那的發展及其國民性有關，並加入描述來自支那社會、革命等面向，以及因各種自然、人為等因素的影響，致使支那文學產生相關特質。謝雪漁漢譯出這段與支那國民性有關的段落：

支那文學。其慷慨激楚之聲。橫溢紙上者。未始不由於此。加之支那為革命之國。內亂外寇。無時或歇。四千年之長歷史。腥血之痕。點々散在。益激成之。排他自尊之情。使其養成保守之習。⁶⁴

這段關於支那文學發生背景的描述，除了支那環境本身的天災、地貧，也包含支那文學在發展與異族間的激烈戰爭，加之支那是革命之國，內亂外寇，養成保守之習，從家長制度，發展為社會組織、封建制度，故：

漢族之倫理教。胥基於家長制度。而發達之者。尊卑上下之別。儼然不可動。道德之極致。為有差等之愛即仁。不見情緒之自由發動。其鍛鍊之久。延及於精神作用。使之不循一定之規則不止。於是其所有文學。往々為保守的。為擬古的。忽又為形式的。為虛飾的也。⁶⁵

其中，由於支那文學受在這些自然、人為等因素的影響後，「其中最為彰著。且值得考察者。即外國思想感化之絕無。與象形文字之影響是也。」⁶⁶卻也更進一步描述支那文學思想存有的外來思想「惟佛教之感化而已」，「至於象形文字 影響。更有甚焉者。第一言語之變化不速。故與擬古者以便宜。第二為不便於使用。故以簡淨為能事。翻添粗大誇張之趣。此關係者。因果聯接。頗增明晰之度。至經四千年之今日。依然存其形跡也。」⁶⁷

64 久保得二述，《支那文學史》（1904），頁7-8。文學士 久保天隨述，雪漁 謝汝詮譯，〈支那文學史 序論（二）支那文一般之特質（續前）〉，《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763號，3版。

65 久保得二述，《支那文學史》（1904），頁9。文學士 久保天隨述，雪漁 謝汝詮譯，〈支那文學史 序論（二）支那文一般之特質（續前）〉，《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763號，3版。

66 同註65。

67 久保得二述，《支那文學史》（1904），頁9-10。文學士 久保天隨述，雪漁 謝汝詮譯，〈支那文學史 序論（二）支那文一般之特質（續前）〉，《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763號，3版。

從文明、文化到人種、文學價值、環境因素，接著以作品、形式、內容的分類進行討論，久保認為關於形式與內容的比重調配，應該是以藝術的形式與內容之協調為上乘，同時形式與內容能闡明國民理想及其對藝術的趣味、社會進步之結果、心理表象之基礎、美學修辭學之規矩等種種特徵。⁶⁸ 久保天隨以「支那文學史」所引領出的文明、文學等概念，提出歐西文學概念與研究方法，以文明、文化的觀點參與現代化視野對支那文學進行論述，同時，也藉由參與支那文學史的建構，將作為中國想像素材之一的支那文學史視為一種書寫媒介，透過對支那文學的再書寫，重新思考文明與文化的發展，進而接近世界的文學與文明觀點。也因此，久保天隨認為先秦時代的典籍是漢文化的淵源、視「支那國民為漢人種」的說法，⁶⁹ 我們可以從他對於漢人種到諸蘭人種的想像與結合，看見一本《支那文學史》呈現了久保天隨對學問的追求，也透露出日本收編東亞、征服東亞的野心。同時，台灣文人謝雪漁以翻譯的方式參與殖民者的支那文學建構，接受文學、文明的觀點，引介了日本研究學問（支那文學史）的方法，也延伸出對於支那文學背後所象徵的文明、文化、人種與地理的想像。

五、結語

1907年，台灣文人謝雪漁漢譯日人漢學者久保天隨撰寫的《支那文學史》，並連載於《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上，譯介了久保天隨對支那文學史的研究態度，也呈現出當時日本本土以支那文學設立漢學科的時代背景。同時，從謝雪漁的漢譯行動，更可以看見台灣文人透過閱讀取得殖民者的支那知識，以及對於文明、文學的看法。

從上述的討論可以歸結出三項重點：首先，呈現1900年代初期，日本對於支那文學作為學問與學科的建立背景，以及台灣人接受來自日本本土的中國知識。透過對於久保天隨《支那文學史》及其版本的討論，能夠理解同時期以

68 久保得二述，《支那文學史》（1904），頁3-4。文學士 久保天隨述，雪漁 謝汝詮譯，〈支那文學史 序論（一）研究之必要及方法〉，《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761號，3版。

69 久保天隨，〈例言十則〉、〈第一講〉，《支那文學史》（1903），頁2-3。

「支那文學史」為題的相關著作的寫作趨向、同一類型著作與作者理念之間的異同、同一著作不同版本的差異。明治40年（1907）7月18日起，謝雪漁開始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上連載漢譯〈支那文學史〉，透過謝雪漁的漢譯，台灣讀者得以知道久保天隨撰述支那文學史的根源是立基在東方的文明、文化，其研究方法是以歐西文學為途徑，觀看的是東亞、東方，並延伸出對於人種與地理的想像。這不僅是撰述者的書寫位置與目的，也包含許多關於支那文學、文明、文化的看法，以及如何對支那文學撰史的評價態度。同時，透過這項議題的研究也能夠呈現支那文學（史）在台灣從漢文傳統、圖書閱讀、研究學科等學問上的變化，以及從文學（史）延伸至人種、地理層面的帝國想像。

第二點是以支那文學（史）進行文明、文學與中國的想像與發言。久保天隨以「東亞文獻研究者」的姿態，運用歐西文學的方法，提出漢族、漢人、東亞等概念，並結合日本對「諸蘭民族圈」（ツラン民族圈）的幻想，擴張地理範圍，作為建立支那文學史的研究方法與文學要素，將「支那文學」從學科屬性被延伸至人種與地理的想像，對同屬東亞文獻圈成員的支那文學進行編纂。而台灣文人謝雪漁依尋著這些概念所進行的漢譯，看似承繼，但是，我們也可以謝雪漁在〈說文明〉與〈文學辨義〉等文章中，看見其對世界文明、東方文化、文學的思考，顯示台、日雙方各自透過「支那文學」引領出不同層次的文明與文學想像。

第三點是關於書寫與翻譯支那文學史的立場與目的。這部分涉及台、日之間如何以支那文學對「中國」進行想像與言說，以及台灣文人對支那文學史在接受與閱讀。由於謝雪漁漢譯久保天隨著作的時間點是1907年，這個時間早於1928年久保天隨來台與台北帝國文政學部文學科設立的時間，因此，在討論謝雪漁漢譯並發表於1907年的〈支那文學史〉時，固然必須了解帝國對台灣在文化上的統合，不能忽略殖民地漢學政策的影響，但在關注久保天隨所處的「書寫優勢」之同時，卻又不能過度放大日人漢學者在日治前期對台灣文人與文壇的影響。透過久保天隨與台灣接觸的時間點、著作版本內容的差異、謝雪漁這類身分背景的台灣人對於支那文學史的閱讀等線索，提醒我們必須重新思考台灣人對於汲取支那文學的主動性，以及由日本傳入台灣的支那文學史的內涵與影響。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ゲーテ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著，菊池栄一、富士川英郎、大山定一、伊藤武雄，〈ゲーテ全集 第十一卷〉（日本東京：人文書院，1965.06）。
- 久松潜一編，〈明治文學全集41〉（日本東京：筑摩書房，1977.03）。
- 久保得二，〈支那文學史〉（日本東京：人文社，1903.11）。
- ，〈支那文學史〉（日本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04）。
- 川合康三編，〈中国の文学史〉（日本東京：創文社，2002.02）。
- 今岡十一郎，〈ツラン民族〉（日本東京：竜吟社，1942.01）。
- 内田泉之助，〈支那文學史〉第3卷（日本東京：共創社，1935）。
- 江寶釵主編，〈黃得時全集11・論述卷五〉（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12）。
- 李慶，〈日本漢學史 第一部：起源和確立（1868-1918）〉（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2）。
- 林正三研究主持，〈瀛社社史之整理、纂修與研究〉（台中：台中市政府文化局，2005.04）。
- 林進發，〈台灣官紳年鑑〉（台北：民眾公論社，1934.10）。
- 洪淑苓、黃美娥主編，〈第一屆文化流動與知識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17.05）。
- 國勢新聞社編，〈台灣新聞總覽〉（台北：國勢新聞社台灣支社，1936.07）。
- 陳瑋芬，〈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的嬗變〉（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06）。
- 森岡ゆかり，〈近代漢詩のアジアとの邂逅——鈴木虎雄と久保天隨を軸として〉（日本東京：勉誠出版，2008.02）。
- 黃美娥，〈重層現代性鏡像：日治時代台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台北：麥田出版社，2004.12）。
- 黃美娥編，〈魏清德全集 壹・詩卷〉（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3.12）。
- 橋本恭子著，涂翠花、李文卿譯，〈島田謹二：華麗島文學的體驗與解讀〉（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10）。
- 謝雪漁，〈奎府樓詩草〉卷上、下（台北：謝師熊，1931.11）。
- ，〈詩海慈航〉卷下（台北：瀛社出版部，1935.10）。

二、論文

(一) 期刊論文

余美玲，〈日治時期傳統文人魏清德的書畫活動與南宗風尚之探析〉，《台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4號（2010.12），頁291-359。

李嘉瑜，〈旅行、獵奇與懷古——久保天隨漢詩中的澎湖書寫〉，《成大中文學報》18期（2007.10），頁117-142。

柯喬文，〈文學成史：殖民視域中的久保天隨與其支那文學史〉，《中極學刊》6期（2009.12），頁43-66。

陳廣宏，〈藤木の「支那文學史」講義について——東京專門學校文學科成立初期の中國文學史講録〉，《中國文學研究》36期（2010.12），頁16。

黃美娥，〈久保天隨與臺灣漢詩壇〉，《臺灣學研究》7期（2009.06），頁1-28。

——，〈從詩歌到小說：日治初期台灣文學知識新秩序的生成〉，《當代》221期（2006.01），頁42-65。

黃得時，〈久保天隨博士小伝〉，《中国中世文学研究》2號（1962.03），頁48-53。

(二) 學位論文

許倍榕，〈日治時期台灣的「文學」概念演變〉（台南：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15）。

陳速換，〈久保天隨及其《澎湖遊草》之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教學班碩士論文，2003）。

三、報紙文章

〈編輯贖錄〉，《臺灣日日新報》5975號，1917.02.17，6版。

〈謝汝銓〉，《臺灣日日新報》8231號，1923.04.23，4版。

文學士 久保天隨述，雪漁 謝汝銓譯，〈支那文學史〉，《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761號，1907.07.18，3版。

——，〈支那文學史 序論（一）研究之必要及方法〉，《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761號，1907.07.18，3版。

——，〈支那文學史（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762號，1907.07.19，3版。

——，〈支那文學史 序論（二）支那文一般之特質〉，《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2762號，1907.07.19，3版。

——，〈支那文學史（三）〉，《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763號，1907.07.21，3版。

——，〈支那文學史 序論（二）支那文一般之特質（續前）〉，《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763號，1907.07.21，3版。

——，〈支那文學史（四）〉，《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765號，1907.07.23，3版。

——，〈支那文學史（百五十）〉，《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963號，1908.03.19，3版。

本社，〈預告閱報諸君〉，《漢文臺灣日日新報》3504號，1910.01.01，15版。

雪漁 謝汝銓，〈次久保天隨博士移居龍安坡瑤韻〉，《臺灣日日新報》11144號，1931.04.23，4版。

——，〈悼久保天隨博士〉，《臺灣日日新報》12281號，1934.06.12，8版。

雪漁攷誌，〈文學辨義〉，《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847號，1907.10.28，3版。

謝雪漁，〈說文明〉，《漢文臺灣日日新報》2249號，1905.10.28，4版。

